

学林

← (上接5版)

中亚地区佛教整体面貌之下,早期法国学者由于受到汉学和伊朗学的强烈影响,对巴米扬年代学研究过分依赖于周边国家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在印度区域研究的惯性,倾向于从印度寻找美术图像的根源。例如,根据佛教美术自西向东传播的基本逻辑,由于《大唐西域记》明确记载629年左右巴米扬大佛已经存在,而且始建于460年的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风格与之相近,因此武断确定了巴米扬大佛建成的下限年代不晚于5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法国学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佛和石窟寺建筑艺术上,这也与早期研究学人的兴趣点相关,这些法国考古学中心(DAFA)的组织成员包含多个学科的专家,比如语言学家、地质学家、建筑师和画家等,这些学人丰富的兴趣爱好,也注定了阿富汗巴米扬初期研究的多样性和斑驳多彩。

DAFA系列考古学著作主要对阿富汗境内的遗迹属性进行了甄别。最初,首任主任富歇(A.Foucher)对巴克特里亚希腊式佛像起源学说进行了实地考察验证,但富歇在巴米扬山谷并没有花费太多研究精力。尽管他在巴尔赫(Balkh)地区的考古基本一无所获,但在其总结性质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对巴米扬和犍陀罗之间的佛教美术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和梳理。富歇认为巴米扬巨佛像是犍陀罗时期的产物,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调。其后哈金(J.Hackin)从石窟建筑与装饰的组合及使用规律出发,对佛教美术样式风格的创举性分析奠定了此后较长时间内的研究基础。这一阶段对巴米扬山谷考古发掘很少,主要是做洞窟清理工作,但很关键的是为巴米扬G窟和附近的丰都斯坦(Foundkistan)山丘的出土材料,提供了重要的断代依据。

此时的很多研究是从风格学说和图像学出发,艺术史学家没有沉醉于佛像起源的假想。美国艺术史教授罗兰(B.Rowland)、日本的吉川逸治首次提出巨佛可能建于6世纪以后,而其他石窟建于这一时间节点前后。而且,日本美术史学

者主要继承了法国学者的基本观点,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对石窟壁画年代和佛教思想的研究上。巴米扬壁画样式的来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确切一点来说是巴米扬艺术的源头来自于哪里。考虑到阿富汗物质文化复杂的属性,艺术史学虽然按照风格学对石窟进行了年代分期,但是因为缺少具体的年代学信息,以至于每一期内的风格来源与传播流变都有继续讨论的价值。

二战前后欧亚大陆政治局势发生巨变,战争损失掉一批欧洲学人,周围地区的动荡也影响到了巴米扬的研究进程。

古代阿富汗与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

1937年哈金进行的贝格拉姆地区持续的考古发掘以及该遗址出土的遗珍,成为当时轰动全世界的发现,阿富汗考古成为全世界焦点。这批文物有来自当时罗马帝国控制地域的玻璃、青铜器,来自印度的象牙雕刻,以及来自中国的漆器、丝绸等物品,让人们看到了当时公元1—2世纪左右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地区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的面貌。可惜的是,该遗址中未见阿富汗本土制造的产品。物质文化交流背景下的阿富汗自身的文化选择,也是考虑其历史时期的重要因素。贝格拉姆的发掘贯穿整个二战,也是阿富汗第一个被完整发掘的遗址。

二战前后法国本土沦陷于纳粹铁蹄,在阿富汗考古的垄断权益也受到蚕食,一直被拒绝入境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在生前最后一个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进入了喀布尔。法国的考古协定出现了松动,虽然其影响力还在,只是等待新的命运裁判。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开始朝着冷战方向发展。

不久,日本、意大利、苏联、美国考察队在中亚和西亚开始活跃起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科兴趣,使得各国学者对巴米扬遗址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日本和意大利两个二战中的战败国,虽

然经历了一番周折才获得海外考古权利,但从长远意义上讲,他们的研究活动应该受到更多重视。因为这两国曾经对中国研究倾注大量精力,二战后无法继续原来的汉学、藏学、东方学等研究,这些研究学人兴趣的更改,使得中国文化研究的烙印再次被镌刻在阿富汗研究上。我们所熟悉的图齐、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等学者,开启了新的阿富汗研究历程。他们几乎都是在中国的田野中成长起来的,原本也没有中亚知识背景,但凭着研究热情,很快对亚洲几乎所有的宗教石窟进行了简单调查,在掌握更大范围考古学材料数据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巴米扬石窟。

尽管如此,意大利和日本考古队还是要绕开法国队进行考古作业,他们发现位于阿富汗东南部、靠近巴基斯坦,从喀布尔到加兹尼这一区域存在印度教与佛教建筑文物相混合的现象。这也是汉文资料最为丰富的区域,从法显、玄奘、慧超等人的记载中也得到验证,一方面表明了地区信仰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巴米扬周边地区后期佛教衰落,一种新兴的密宗美术开始传入的面貌。这些深刻地影响着阿富汗佛教美术的面貌,已经很难再从中观察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法国、苏联对阿富汗境内北部地区的希腊化和贵霜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改变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历史印象;1964年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的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西方史料的记载,为研究希腊化文化在远东地区的传播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1964—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大量的希腊文物出土,法国国内对于阿富汗考古兴趣也发生了改变,从佛教考古逐渐倾向于希腊—罗马考古,阿富汗北部地区因而成为DAFA后期的工作重心。

同时苏联考古队对于巴克特里亚地区贵霜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1977年蒂拉丘地墓葬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从希腊化时代到贵霜朝的过渡问题,阿富汗的历史由于地下资料的发现得以整体串联起来。这批游牧民族的墓葬实际发掘了6座,出土了2万多件金器,一些文物



东大佛被毁后

可以看出希腊化—罗马文化的影响,同时,代表游牧民族审美的造型美术也得以体现出来,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

然而,一些区域化的精细研究却面临地域之间组合的问题。因为阿富汗的山地环境决定了会有很多独立小王国的存在,这些小王国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和政权,一些游牧民族政权虽然失去霸主统治地位,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其部落和民族仍然在一些地区占据着重要位置。在经历众多研究后,国际上渐渐公认巴米扬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小型王国,巴米扬并没有发行过钱币,有可能只是一个宗教和文化中心,而非政治中心,关于其辉煌的佛教时期的主体民族属性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现在来看,在巴米扬山谷贫瘠的土地上为何会有如此兴盛巨大的佛教美术遗存,从经济因素考虑其实是矛盾的。对巴米扬遗址周边的物质遗存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发现巴米扬周边地区并没有丰富的贵金属矿产,其农业水平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条件。巴米扬佛教美术的辉煌从何而来,也一直困扰着学界。巴米扬遗址兴盛的年代基本确定在6—7世纪,对其突然兴盛的经济因素进行解释时,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和古代丝绸之路引起的交通变化成为公认的观点。

当所有巴米扬的地表遗存

研究都要等待地下资料进行验证、不得不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断了所有考察工作。

战乱中巴米扬山谷流失的一批古代珍贵写本,主要流往欧洲和日本,学者从中解读出以往未知的佛教教义和物质文化内容。根据出土经卷研究结果显示,自2世纪末至4世纪后,佛教僧团使用佉卢文的犍陀罗语言转变为使用梵文对这些经典进行了重写,但转变的原因尚不清晰,有可能源于教团更替和教义改变,这也为大乘佛教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通过分析新发现的佛经写本资料,可以窥探3至8世纪的文字书写和语言传播痕迹,对比汉语文献资料,也可以观察出佛教信仰内容的变化,为此前的图像学研究提供了部分文本支持。因为中亚任何一个地区的佛教信仰的混杂程度都超乎想象,在家信仰和出家僧侣并存,各自对于佛教大小乘区别辨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产生各种信仰形态。我们也必须想象中国僧侣的游历中,由于旅行时间和接触人群关系等条件的限制,需要“疑古精神”对《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进行再次研究和判断。

巴米扬山谷地下的秘密

巴米扬学术史的第三阶段以2002年巴米扬遗址考古工作的再次启动为契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筹下,世界各国对阿富汗展开援助。联合国组织日本和德国运用最新的科

巴米扬山谷全景(照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提供)

